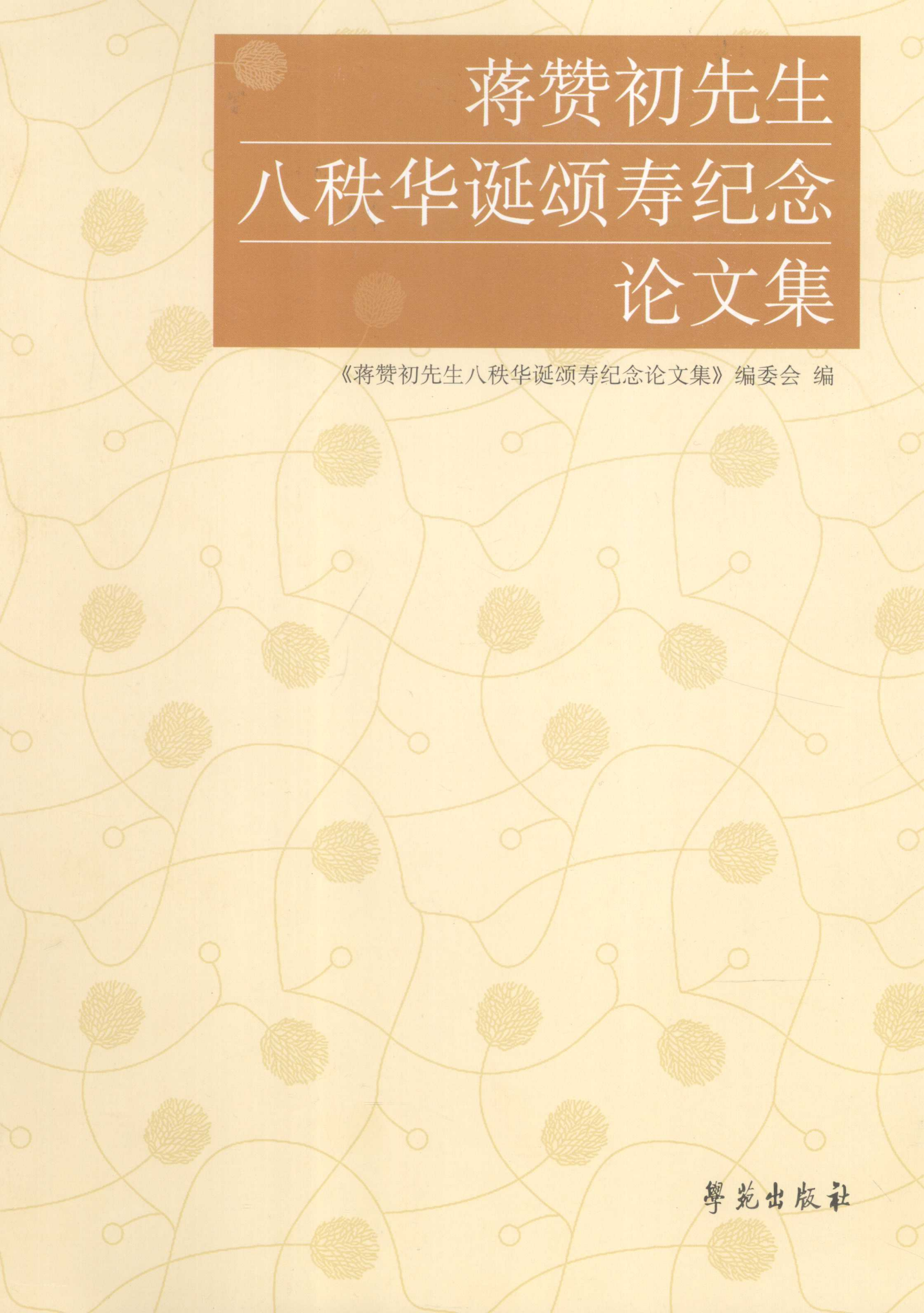




蒋赞初先生 八秩华诞颂寿纪念 论文集

《蒋赞初先生八秩华诞颂寿纪念论文集》编委会 编

學苑出版社

蒋赞初先生八秩华诞颂寿 纪念论文集

《蒋赞初先生八秩华诞颂寿纪念论文集》

编委会 编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蒋赞初先生八秩华诞颂寿纪念论文集 / 《蒋赞初先生八秩华诞颂寿纪念论文集》编委会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077-3414-0

I. 蒋… II. 蒋… III. ①蒋赞初—纪念文集 ②文物—考古—中国—文集 IV. K825.81-53 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2991 号

责任编辑: 潘占伟

装帧设计: 徐道会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71101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保定华升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 27.375

开本尺寸: 850 × 1168 1/16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60.00 元

目 录

蒋赞初	南京城内唯一的史前和商周遗址 ——追记北阴阳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 1
蒋赞初	初识秦墓 ——关于楚国郢都遗址内的几座秦墓的发掘 / 10
蒋赞初	巧遇楚王陵 ——记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的发掘 / 19
蒋赞初 张 彬	南唐二陵发掘漫记 / 27
蒋赞初	关于金陵大报恩寺与琉璃塔的历史渊源问题 / 39
蒋赞初	关于南京云锦发展的历史过程 / 42
王能伟	贺蒋赞初先生八十寿诞 / 49
朱兰霞	永远的楷模 ——颂蒋赞初先生的三范精神 / 51
海蔚蓝	良师如灯 ——记我的导师蒋赞初先生 / 53
龚 良	温和敦厚 执着坚强 ——近年来蒋赞初先生为江苏文物保护所作出的贡献 / 55
卢海鸣	师生缘·书缘·城缘 / 60
阚绪杭	淮河流域双墩文化及其序列的初步探讨 / 65
孙维昌	从福泉山发掘看良渚文化玉器 / 86
宋 建	良渚文化的社会阶层与等级 / 102
黄建秋	石铈研究方法 / 110
王根富	农具与文明 ——石斧、石钺、玉钺的演变关系探究 / 119
张建华	试析豫中地区早期龙山文化 / 129
赵 晔	王者气象 ——良渚遗址群解读 / 140
闻惠芬	良渚文化 ——传统文化渊源考 / 147

田名利	分合式玉璜和分合式玉器简论 /162		
周 言	“双元年说”证据辨疑 /169		
张 勍	越史小考 /178		
吴桂兵	变迁时代、征服与融合 ——长江三峡地区秦文化因素遗存辨析 /190		
李银德	始皇陵地宫原始文献的考古学解读 /204		
耿建军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陪葬人位置问题初探 /214		
裘士京	论铜陵古代铜矿采冶的兴衰与特点 /218		
邱永生	传承汉代文明 弘扬民族精神 ——徐州汉文化景区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225		
刘兴林	汉代农业考古的回顾与展望 /230		
丁金龙	朱永兴	从阳澄湖、独墅湖、澄湖等湖底出土文物论苏州环境变迁 /248	
	韦 正	忠县涂井崖墓的时代与相关问题 /253	
贺云翱	冯 慧	李 洁	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钱纹陶瓷器的研究 /263
		张学锋	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发掘与复原 /276
		王志高	公州宋山里6号坟几个问题的探讨 /293
朱雪菲	王根富	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东晋墓地的开发与利用研究 /317	
	崔世平	临淄北朝崔氏墓与清河崔氏乌水房 /326	
王会民	马冬青	邢窑的装饰艺术 /332	
	段惠青	宋朝医疗救济初探 /338	
	祁海宁	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高度考 /343	
顾苏宁	马 涛	南京明代纪年墓出土瓷器浅论 /354	
	郭伟民	中国考古学的类型学实践 /367	
	孙长初	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 /383	
	胡阿祥	南京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平议 ——附及南京历史地图的编绘 /393	
周裕兴	丁利民	中国的百济史研究 /404	
	夏梅珍	万里和亲第一人 /413	
	朱 明	关于南京明城墙的历史典故和民间传说 /415	
	殷志强	和田玉的文化意蕴 /421	
	韩文宁	蒋赞初先生学术年谱 /424	
编后记 /430			

南京城内唯一的史前和商周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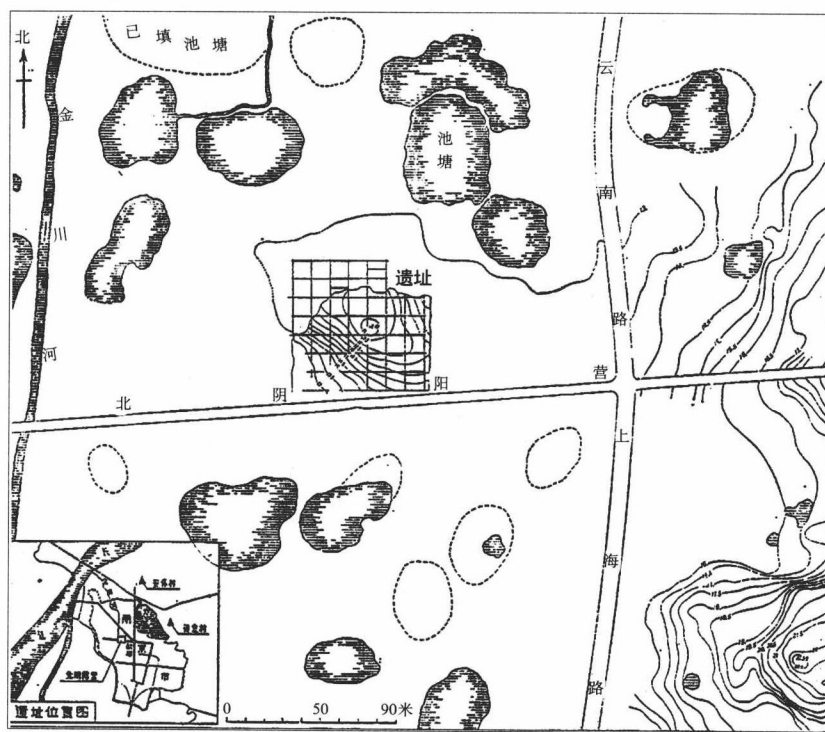
——追记北阴阳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在南京老城（明代初年的都城）中心点鼓楼岗西面的1公里许，有一条南北向的通江水道——金川河的上游在此缓缓流过，北阴阳营遗址就位于这条河道的东侧百余米的二级台地上。（图一）

说起北阴阳营这个地名，还有着—个历史典故。在明代初年，南京城内鼓楼岗以北的地方都被划为驻军区，金川河的上游就驻有一支名为“鹰扬卫”的禁卫军，并由此而得名“鹰扬营”。但在明亡以后，这里变成了菜农的家园，或许是某个时候曾经居住过小有名气的阴阳先生，鹰扬营也就被讹化称为北阴阳营，而且出现了南、北阴阳营两个地名。到了民国时期，南阴阳营成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职员宿舍区和居民区，北阴阳营成则被金陵大学农学院辟为农事实验场。解放以后，经过1952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阴阳营遗址成为属于南京大学职工宿舍里的一片空地。

1954年的秋天，南京大学主办的工农速成中学准备在北阴阳营的这片空地上兴建新校舍，在平整土地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石器。由于这处遗址的西面是一座小学的操场，小学生们在课后便拣拾磨光的石器作为玩具。此事随即被时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韩儒林先生得知，他派人收集了一部分石器标本送交南京博物院。博物院的尹焕章先生等也很快来到现场调查，确认这是一处相当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并向南京大学校方提出了先发掘后施工的建议。

第二年（1955年）的春天，经过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批准，南京博物院对北阴阳营遗址进行正式发掘，由赵青芳先生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发掘组的成员有张正祥、李连春、黎忠义等同志，分别负责测量、照相、绘图等工作。赵、张、李、黎四位都是解放前参加文博工作的老同志，我则刚从第三届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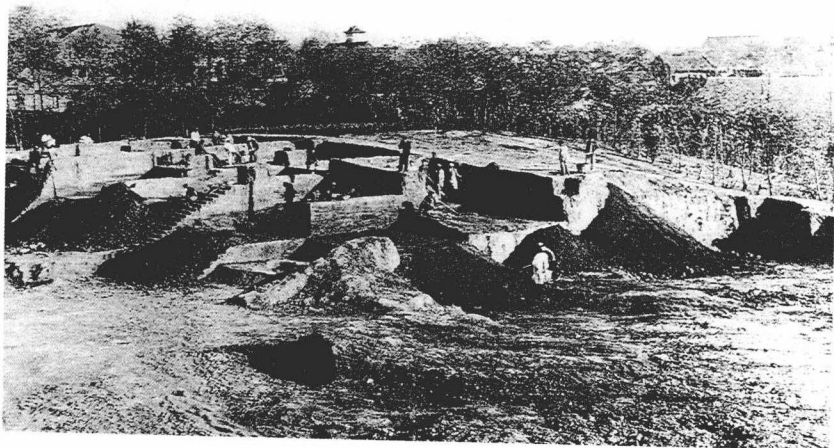
图一 北阴阳营遗址地理位置及地形图

考古训练班辅导员的岗位上归来不久，所以就学习西安半坡村遗址发掘时的布方经验，先对遗址进行全面测量后，按 10×10 米的规格进行布方。测出遗址的现存面积为7100平方米，原面积大约应有万余平方米。它的南部被早年开辟的北阴阳营小巷破坏，西部被小学操场破坏，西北部因近年来平整土地被破坏，北部还发现有一座抗日战争时期的防空洞。遗址的外围，除西面是金川河外，南北西面原有一些大小不等的池塘，在发掘前还留有十余个，可见当年遗址的所在，本是一处三面环水的台地。它的东面是一片自西至东的低山丘陵区，自鼓楼岗、鸡笼山（北极阁山）、覆舟山（小九华山）和富贵山直抵钟山（紫金山）的西北麓，海拔高度在25-80米之间，很便于先民们的生产生活。（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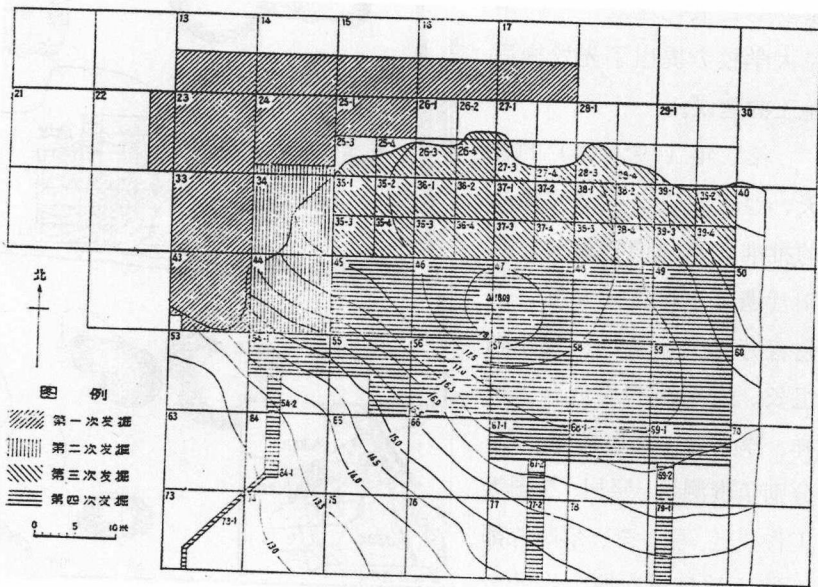
这处遗址，我们曾经以为是当时的最新发现，后承夏鼐先生告知，早在抗日战争以前，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教师就曾经在该处发现过石器。所以1954年是再次被发现，并被提上了考古发掘的日程。

遗址的正式发掘是从1955年2月23日开始。我们决定先从表土层和部分文化层已被破坏了西北部入手，其面积将近1000平方米左右。在发掘开始后不久，又获悉工农速成中学不拟再在此处兴建校舍，院方也就改定为逐年分期发掘。发掘共进行了三次，将主要的文化堆积基本上发掘完毕。第二次和第三次我没有参加具体的发掘工作，到第四次我又带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参加了发掘，直至结束。所以，本文是以笔者第一次和第四次的发掘经历作为基础，并结合第二、三次的主要发掘成果（据《北阴阳营》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写点个人体会。（图三）

在第一次发掘时，最先面对的是文化层堆积较厚而又含水量较高的黄灰土层和深灰土层，出土的遗物为大量的泥质红陶或灰陶的几何印纹陶片，我们称之为“印纹软陶”，几何印纹硬陶片则很少见，但以鬲、甗为主的夹砂



图二 遗址第一次发掘现场



图三 北阴阳营遗址发掘坑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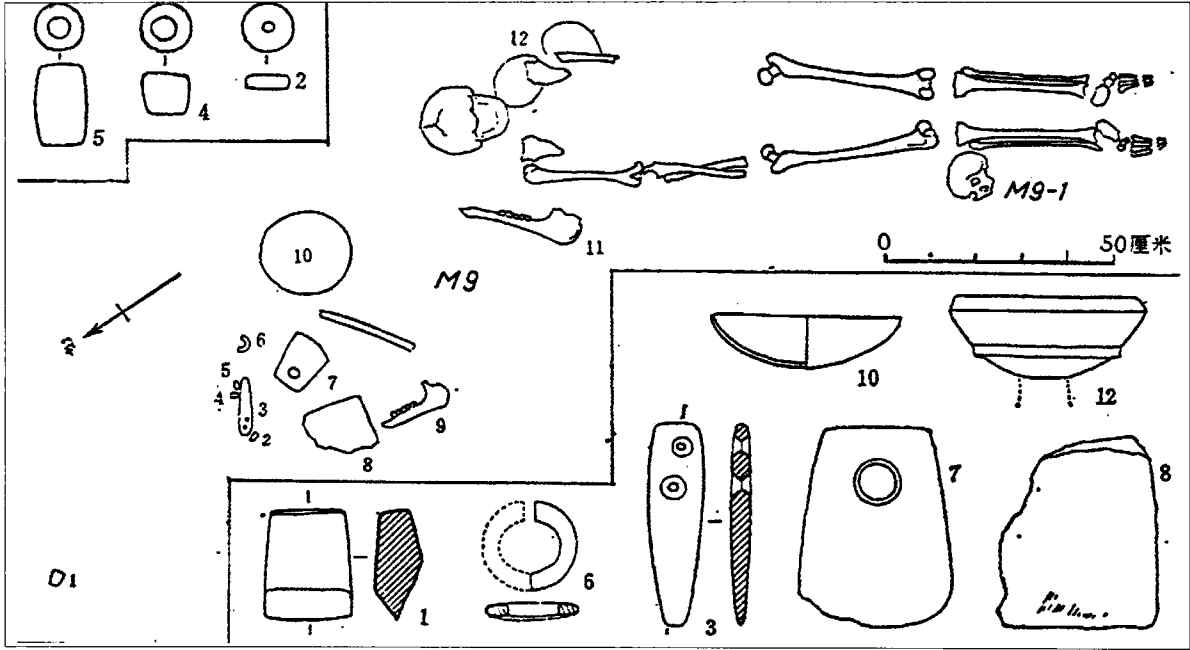
红陶或灰陶的炊器碎片发现较多。这些遗物特征均与当时才发现不久的南京近郊江宁县湖熟镇附近的青铜时代遗址群的文化内涵相近。因此，我们就将北阴阳营遗址的黄灰土层和深灰土层合称为“上层文化”，而将其下包含遗物与之不同的地层称为“下层文化”。

在这次发掘的位于遗址西部的下层文化层，土色黄褐，由于土中夹有大量的烧土碎屑，所以土质相当坚硬，也比较干燥。这层的墓葬比较集中，我们在4个探方里就发现了88座墓葬。其埋葬方法是将死者置于生土面上直接用夹有烧土屑的硬土掩埋，但缺乏明显的墓坑痕迹。上面再用同样的硬土掩埋一位死者。最多的可以自上而下掩埋4层，每层的厚度在0.3—0.8米之间。而且，其中只有极少数墓葬可以看出打破关系，大部分墓葬只能根据其埋葬的深度来辨别其早晚关系。在葬式上是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少数是单人俯身直肢葬，极少数二次葬，还有个别的成年人与儿童合葬墓（图四），头向以北偏东者居多，向北者也有一定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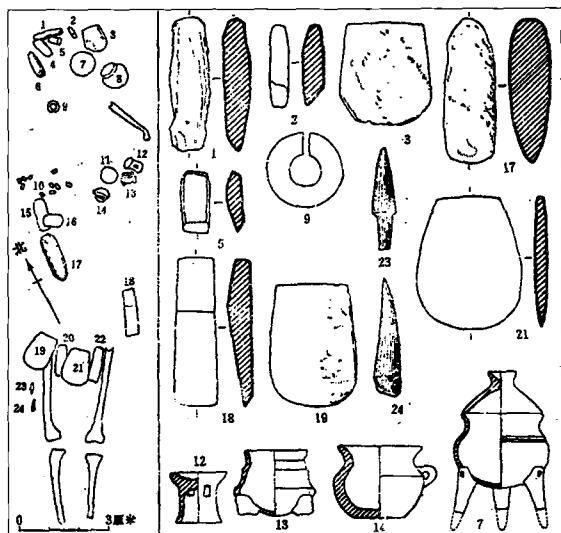
这批墓葬随葬品的情况也颇具特点。从随葬品的数量来看，大约85%的墓葬是在12件以下，并以3—10件居多。类别以陶器为主，石器和玉石饰品次之。随葬品超过12件的多数是由于玉饰品和花石子（雨花石）的增加，或者是石器和陶器的增加。以随葬品最多的3座墓葬为例。如M74有39件随葬品，其中玉饰品就占了31件，包括玉管28件，玉坠、玉玦、玉璜各1件，另有陶鼎、豆、碗、盆、罐各1件，陶钵3件，其中玉管应属一串，也许还可包括玉坠在内。

M57有38件随葬品，其中玉饰品就占16件，包括玉管7件、玉坠4件、玉璜3件，小玉环、玉坠各1件，还有花石子7件，而玉管、玉坠和小玉环同属串饰。另有陶罐3件，鼎、匜各2件，豆、碗、盆、钵各1件，以及石纺轮2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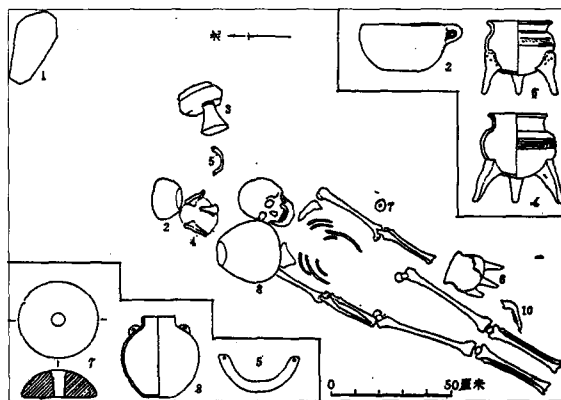
M33有33件随葬品，其中玉饰占11件，包括玉管10件和玉玦1件，另有石斧3件，石锛11件，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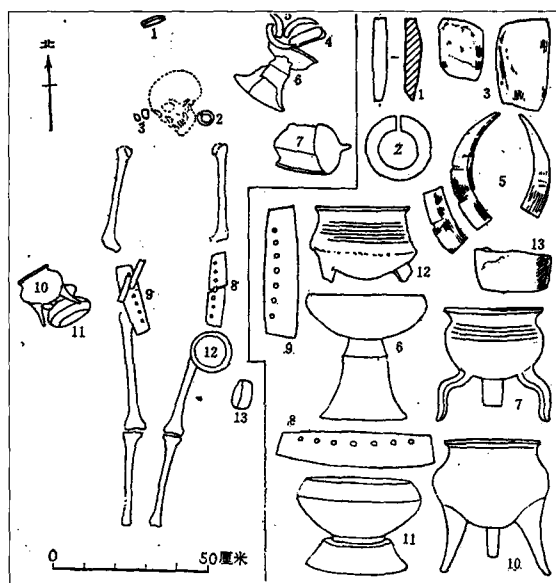
图四 M9、M9-1 平面图及随葬器物



图五 M33 平面图及随葬器物



图六 M79 平面图及随葬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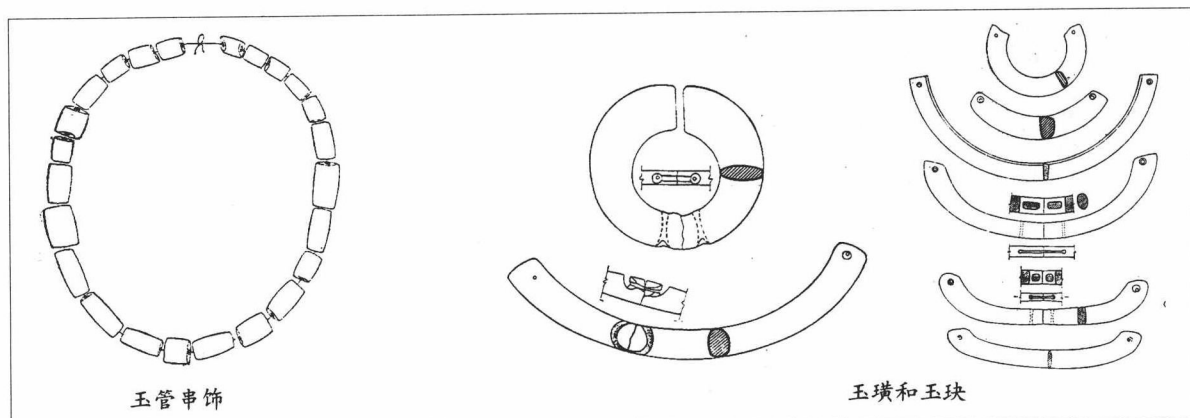


图七 M131 平面图及随葬器物

鼎、罐各2件，陶豆、彩碗各1件，骨镞、骨锥各1件。(图五)

由于早年报道北阴阳营遗址的发掘的情况时，曾经提到这批墓葬中随葬品最多的1座有40件(按：即指M74，因该墓的玉璜在出土时是1对，但可缀合成1件)，最少的只有1件，甚至没有随葬品；又提到有少数几座墓用猪的下颌骨或牙床随葬。因此，就曾经被有的通史著作引证过，认为是氏族社会末期贫富分化的一种重要迹象。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及的，仅仅是玉饰品和花石子的增加，或者是陶器和石器的少量增加，恐怕不足以说明贫富的分化。同样，这批墓葬中所发现用猪的下颌骨和牙床随葬的少数几座墓，却又是随葬品较少的墓。如用2件猪下颌骨合葬的M9，只有其他随葬品10件，包括玉管2件、小玉环和玉块各1件、砺石1块、石斧和石铤各1件、陶豆和陶铤各1件，也不能看出是属于富人或是权贵的墓葬。由于此墓是成年人和男性儿童的合葬墓，用猪下颌骨随葬也许是反映了这种特殊的情况。用猪牙床随葬的3座墓中，一座随葬有玉璜2件，陶纺轮1件，陶鼎2件，陶豆、钵、罐、尊各1件，再加猪牙床1件(M79)(图六)；一座随葬有花石子1件，石斧5件，再加猪牙床1件(M29)；还有一座仅随葬花石子2件，再加猪牙床1件(M31)。因此上述的考古资料，似乎也不能将北阴阳营的史前墓葬用猪牙床随葬的情况理解为财富不均的象征，只有一座第二次发掘的M131，除常见的陶鼎、豆、罐、石铤、凿、砺石和玉块外，还有仅见于此墓的2件长方形七孔石刀、4件带有刻纹的野猪獠牙，以及鹿角和鹿牙床各1件，似可以认为是氏族中的特殊人物。死者生前是氏族首领，抑或是优秀的猎人，还需进一步分析研究。但此墓随葬器物的总数也只有19件。(图七)

关于这批随葬的玉石装饰品的原料来源，当时我们的想法是玛瑙石和花石子显然是采自南京南郊的雨花台一带。雨花台古名石子岗，又称玛瑙岗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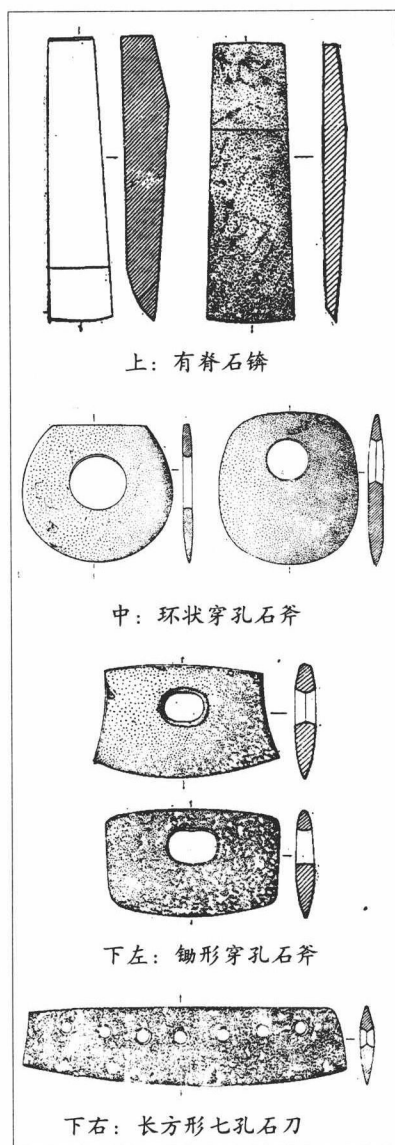
图八 出土玉器

聚宝山，自古以来即以盛产玛瑙石和花石子而闻名于世，地质学界认为它们是200万—300万年前古长江的堆积物，所以或许也会有由水力冲积而来的其他玉料。近年来，有些学者认为江南发现的史前玉器（特别是良渚文化的玉器）的原料主要产自南京东南百余公里的溧阳市小梅山，此处玉矿我们曾经考察过，但同行的玉器研究专家并不认同此说。当然，北阴阳营的先民们跋涉上百公里去取得玉料并非不可能，但也可以通过氏族间的交换取得。（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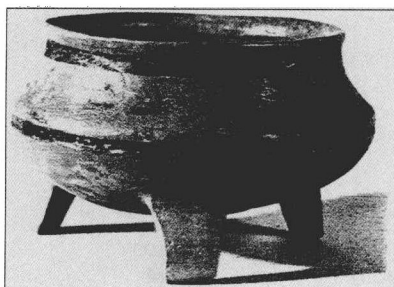
随葬石器的墓葬在北阴阳营下文化层的墓葬区内约占半数左右，又以石铤所占的比例最大。有一种肩部带脊的长方形条状石铤比较突出，我们曾经也称之为有段石铤，认为是流行于南方史前文化中的一种带特征性的石器，现在看来称为“有脊石铤”可能更为合适。（图九，上）穿孔石斧的数量大体上是石铤的一半左右，除常见扁平舌状的穿孔石斧外，还发现有器形较为特殊的环状穿孔石斧和锄形穿孔石斧（图九，中、下左），石凿和石纺轮也常有发现，至于石刀则仅见如前所述的长方形七孔石刀两件（图九，下右）。经过鉴定，石器的原料多产自紫金山北麓的蒋王庙一带，如石铤的主要原料页岩，即与紫金山的命名是由于盛产紫色的页岩之说相吻合。

陶器是这批墓葬中最普遍的随葬品，在器形上流行三足、圈足和平底，常见带盖、带流、带把和带鋬器。在器类上以鼎、罐、豆、碗、钵、盂、盆7种发现较多，其中具有外撇的凿形三足的罐形鼎、带双耳的直颈扁鼓腹平底罐、带喇叭形圈足的镂孔豆、带圈足并有白衣红彩或红衣深红彩的碗、内绘黑彩的钵和外壁施红衣内壁绘彩的双曲腹钵、带管状流和宽带状把手的盂，以及带折肩的红衣黑彩盆等较具特殊性。（图十至图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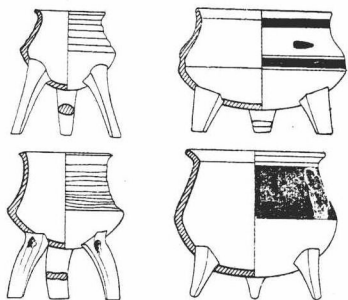
此外，还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粗制小器皿，如小鼎、小罐、小豆、



图九 出土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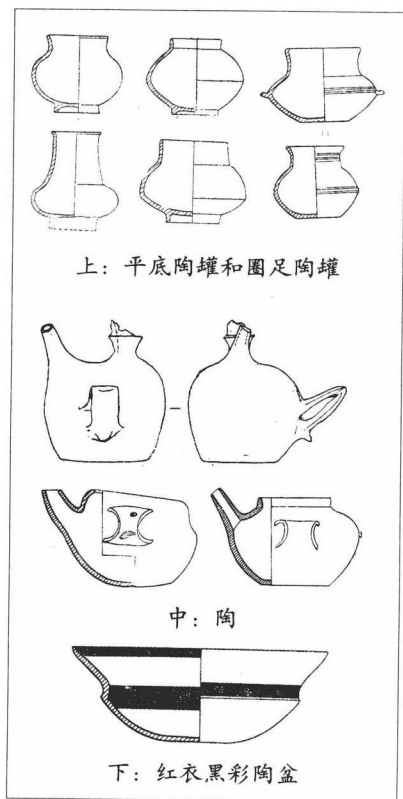


上：红衣黑彩陶鼎



下：凿形足陶鼎和短足带彩鼎

图十



上：平底陶罐和圈足陶罐

中：陶

下：红衣黑彩陶盆

图十一

小尊等，似为专作明器之用。(图十三，下)

由于此遗址发掘时，江南一带还缺乏可资比较的史前墓葬资料，所以当时只能依据随葬陶器中的鼎、盃、豆、罐、钵等部分器形与内壁彩绘和红衣红彩等装饰方法上的相似性，归属于当时江淮之间业已发现是“青莲岗文化”的范畴。后来，鉴于北阴阳营这批史前墓葬的地区特征，又提出了“北阴阳营文化”的称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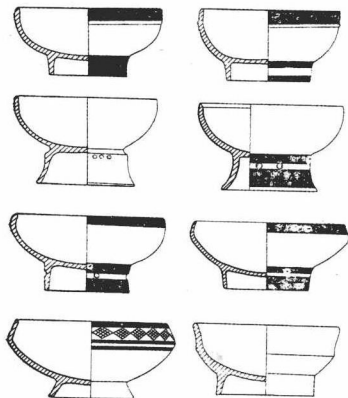
北阴阳营遗址的史前墓葬区除西部边缘被破坏外，其余均集中在第一次发掘的西部4个探方，以及与之毗邻的第二次发掘的2个探方内。在这600平方米的范围里，共发现墓葬达228座，再加上相连的偏中部的3个探方内发现的30座墓，合计为一个多达258座墓葬的墓区，也就是我国考古界公认的“北阴阳营文化”的代表性遗存。后来在《北阴阳营》发掘报告中被认定为该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第二期。

此外，在第一、三、四次发掘中，又在遗址中部和东部的居住区边缘地带，发现了分散埋葬的史前墓葬13座。它们在随葬品上的特点是陶器中罐形鼎和盆形鼎的足均呈窄面向外的扁三角形，出现了与“崧泽文化”相同的花瓣形矮圈足的罐、折腹圈足罐、折腹壶，以及腹下带垂棱的豆，缺乏西部墓葬区常见的圈足碗、圈底或平底的钵、平底盃、平底罐和彩陶器；石器中的石镑类型单一，只有长方形条形的一种，由长方形扁平穿孔石斧代替了舌形穿孔石斧，并且罕见玉石饰品。据后来的研究，这批墓葬时代应晚于西部的墓葬区和中、东部的居住区，是居住区被废弃后入葬的。因此，此期文化定为该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第三期。

除史前墓葬的发现外，第一次发掘时还在遗址北部偏西的探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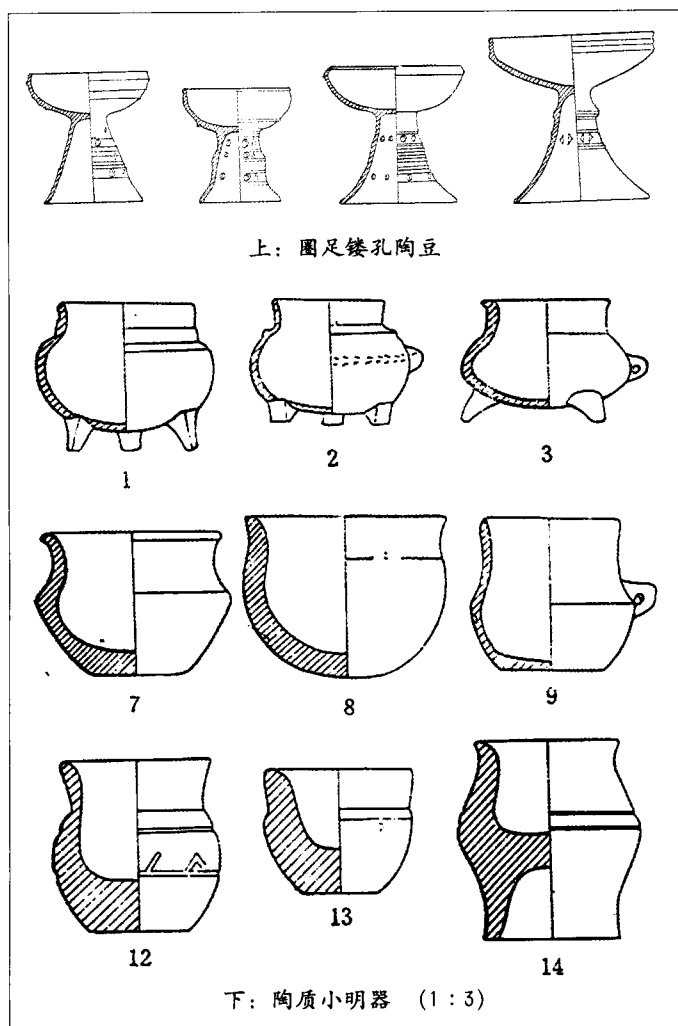


白衣红彩圈足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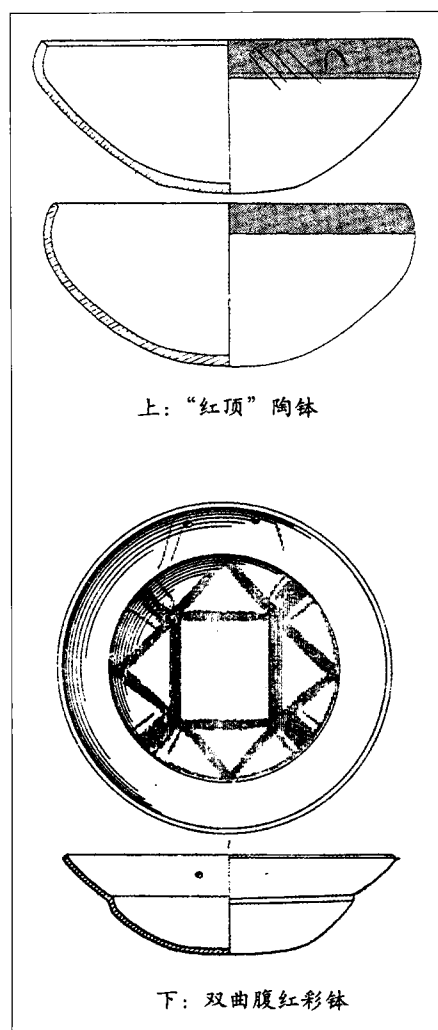


各形圈足碗

图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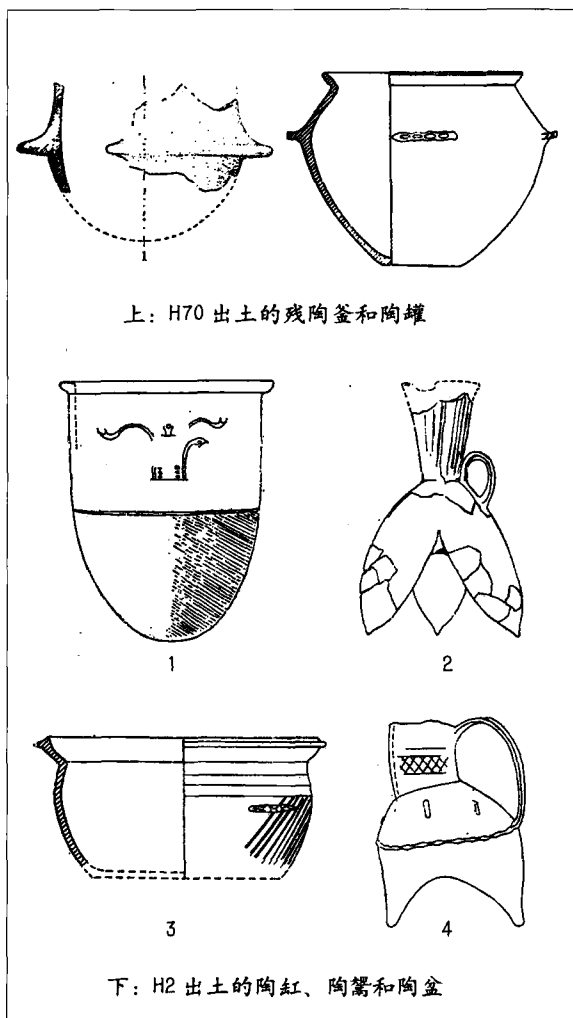
图十三



图十四

地层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灰坑——H2。坑口开在深灰土层的下面，坑底挖破了生土层。此灰坑由赵青芳先生亲自动手清理，共发现了陶鬲3件，陶缸、陶盆、石镞、石圆饼各1件。（图十五，下）经后来的研究，其中粗颈鼓腹弧裆袋足的鬲，以及刻画有飘带纹和圆圈纹的深腹圜底篮纹缸，均具有明显的大汶口文化的特征；而另一种细长颈捏流高裆细长袋足的鬲，又具有良渚文化的风格。这一发现表明该地区受到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南方良渚文化的双重影响，或者说当时这两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曾经在这里“碰撞”过。因此，这期文化被定义为该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第四期。

在第三次发掘时，继续了第一次开始发掘的遗址北部居住区，并向南、向东扩展。在中部偏北的近底层，又发现了两处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灰坑——H68和H70。这两座灰坑的坑口均开在黄褐土层之下，并出土有相同陶系和器形的夹砂红陶片和兽骨等。从出土陶片中常见的腰沿釜残片看，以腰沿平直的浅腹釜居多。（图十五，上）一般认为，腰沿釜是马家浜文化中的罗家角类型，但在淮安青莲岗遗址中也有发现。据后来的对比研究，认为H68和H70出土的浅腹腰沿釜更接近青莲岗遗址的同类器。另外，H70出土的侈缘鼓腹小平底罐腹上的鸡冠形耳装饰，也始见于马家浜文化晚期，流行于崧泽文化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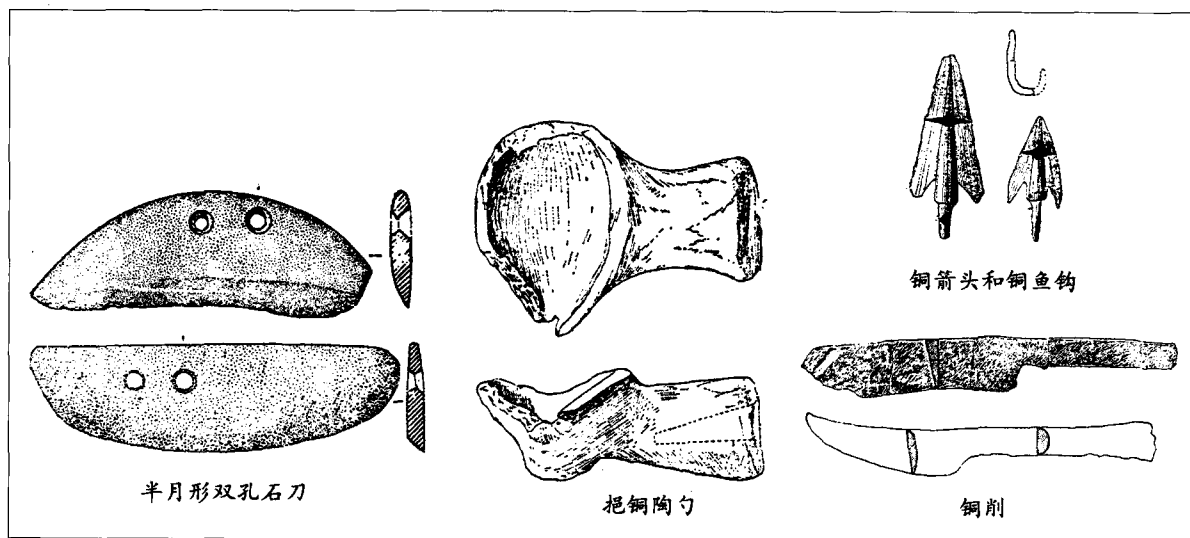
图十五

如此看来，这两处在灰坑中出土的早于西部墓葬区的遗物，也带有南北文化“碰撞”的迹象。这期文化后来被定为该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第一期。

第四次发掘在1958年的春夏之际进行。当时正处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学校方面要求师生大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考古部门则希望在高校有关系科的协助下进行高效率的、规模较大的发掘工作。这样，南京大学历史系与南京博物院就签订了协议，由三个年级的学生承担北阴阳营遗址的第四次发掘的全部发掘劳动，各年级的辅导老师也一道参加，此外，还有毕业班的6位同学在遗址进行考古实习，并写作毕业论文。3个多月内，前后有200位师生在遗址参加了发掘劳动，发掘面积达1300多平方米，可以说是当时高校历史系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活动之一。

这次发掘由尹焕章先生主持，我作为历史系的代表协助尹先生工作，并共同指导毕业生论文。发掘的范围是延续了前三次发掘的地点，在遗址的中部偏南和东部地区进行发掘，至1958年7月20日，基本上将主要的文化堆积发掘完毕。

由于此次发掘的对象主要是居住区，所以发现



图十六

的遗迹与遗物基本上与第三次发掘的相类似。在上文化层（黄灰土层和深灰土层）发现的遗迹以灰坑和火塘为主，并发现了4座陶窑；比较突出的遗物有鹿角斧、半月形双孔石刀、铜鱼钩、铜削和挹铜液的陶勺等。（图十六）在下文化层（黄褐土层），与西部墓葬密集地带相连的3个探坑中，也发现了同属一个墓区的30座墓葬。在居住区内则发现了一些烧土堆和狗骨架。

在这次发掘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有意识得保存了一些发掘出来的遗迹，包括陶窑、灰坑和墓地等，并拟在有条件的时候仿照西安半坡博物馆的先例，建设一座遗址博物馆。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不仅建馆的愿望迟迟未能实现，而且保存下来的一些遗迹，也于发掘结束10余年后被改作建房的地基。就这样，最能表现南京城历史的城内唯一遗址便从此难觅踪影了。

由于事隔40余年，笔者的记述和判断或许有误。有关此遗址的确切资料，请读者以《北阴阳营》遗址发掘报告为准。

（2003年3月完稿）

蒋赞初

初识秦墓

——关于楚国郢都遗址内的几座秦墓的发掘

1975年的3—4月间，我带领南京大学考古专业第一届的5位同学再度外出“开门办学”。该次考古教学和实习的地点是在湖北江陵楚国的郢都遗址。我们通过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考古队接受纪南城文物保护和发掘领导小组的安排，参加了郢都纪南城东南隅凤凰山古墓群的发掘。这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考古大会战”之一。一起在纪南城做考古工作的人员，除了湖北省文物工作队和荆州地区博物馆的同志外，还有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和我校等高等学校考古专业的师生，以及上海、湖南、河南、四川、山西等省市的考古工作者。在各个工地之间，经常进行互访和考察活动，交流发掘经验。在整个纪南城，到处都可以发现考古工作者的身影。

凤凰山是纪南城唯一的高岗，海拔为35米，高出该城的平原地带10米左右。考古钻探资料表明，在楚国建都时期，山的东南麓一带分布有多处高台建筑物的基址，应属宫殿遗迹。

在我们到达之前，湖北省的考古钻探队已经在凤凰山高地的范围钻探出上百座墓葬，曾由“长办”第二期考古人员训练班于1973年下半年首次发掘了位于山南麓的9座墓葬，并撰写了简报（见《文物》1974年6期）。从简报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凤凰山一带约在郢都废弃以后，于西汉时期成为墓地，墓葬的形制均属楚文化传统的土坑竖穴木椁墓，以一棺一椁的中小型墓为主，椁的上下四周均填塞有俗称为“白膏泥”的青灰色黏土，以期起到密封的作用。木椁上有盖板，下有底板和垫木，椁室内常隔成棺室、头厢和边厢三部分，在棺室通向头厢和边厢的隔板上或设有象征性的门窗。随葬品以漆木竹器和陶器居多，陶器的组合为壶、罐、盘、钵、豆、甑、釜和仓、灶，但少见铜器，未出玉器。

但是，在我们具体发掘凤凰山顶偏东的3座中小型墓的过程中，却发现这几个墓葬除了在形制上与南麓西汉墓之间的共同性较多，以及在随葬品方面也以漆木器为主外，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鉴于当年我们在工地初步整理出来的发掘简报（1975年油印本）目前已经没有条件再正式发表，所以拟在文中稍作一些资料性的介绍。

以纪凤M70（冷贤墓）为例。该墓的方向为 347° ，接近正北方向。墓口到墓底的深度为3.98米。墓坑内上部的填土是经过夯筑的五花土，夯层一般厚0.16米左右，夯窝多作方形，长宽均在0.04—0.06米之间。在五花土中夹杂有较多的碎片。下部填土从椁盖板上方0.7米处开始，就用“白膏泥”填塞椁的四周，直到墓坑底部的生土面。只是此墓的“白膏泥”填塞得不够严密，地下水已大量渗入椁室，以致椁盖板被水长期浸泡后朽不成形，椁室内积满淤泥。椁室长4.18米、宽1.90米、高1.40米。由于地下水的作用，棺室和头厢之间的隔梁和隔板也均已腐朽变形或移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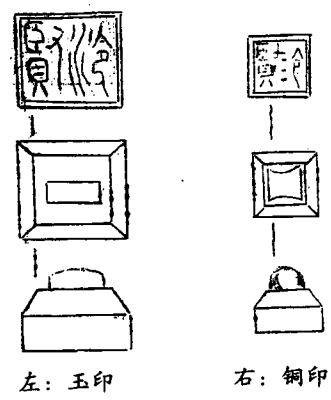
椁室上部的这种朽坏状况，使大家都有些担心：这座墓会不会是一座考古价值不大的残墓呢？作为带队的教师，我当即向学员们讲明，我们发掘古代墓葬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它了解当时的墓葬制度与

丧葬习俗，以及各类随葬品的工艺制作水平，如果保存有较完整的建筑结构和人体骨架，还可借以研究当时的建筑技术、人种问题以及疾病问题等。完整的墓葬固然能够说明较多的问题，但即使是残破的或者是盗掘过的墓葬，仍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因为古代的墓葬多半被盗掘，或者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其劫余的墓葬结构和随葬器物，仍然是考古研究的对象之一，也是历史性质博物馆藏品的主要来源之一。特别是作为考古实习，更需要了解各种性质的古墓葬，要防止单纯的“挖宝”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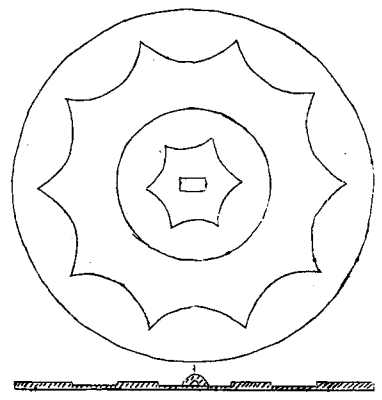
在安定了学员和工人们的情绪以后，就开始进行椁室的清理。鉴于棺盖已被水力掀开，浮动并斜压于边厢的淤土之上，我们就先行清理棺内的淤泥。棺为长方形，长2.18米，宽0.76米，棺口已被破坏，残高0.33米，内外均髹以黑漆。棺内淤泥被清除掉三分之二左右的时候，开始露出随葬器物。其中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一方篆书“冷贤”两字的墓主人玉印的发现（图一，左），还有环、璜、佩、觿等4件玉佩饰（图三至七），琕、琕、琕等3件玉剑饰（图八至十），以及桥形小钮的连弧纹铜镜1面（图二）。另有椭圆形漆奁1件，残漆耳杯3件和残木梳1件，上述器物均分布于棺的左半部。

接着清理头厢内的淤泥。出乎我们意外的是，在厢的底部不仅发现了包括鼎、釜、釜、洗、匕、勺、卮等一组铜质饮食器（图十一至十五），而且有发现了1方篆书“冷贤”的铜质印章（图一，右）和1件精致的带钩（图十八），还发现了鎏金杯形铜车饰（可能是车棚顶部铜饰）1件（图十六）和轴形铜车饰2件（图十七），以及铜小环4个，连同头厢内出土的1根长达1.50米的木盖弓、木牛1件和木樨1件，这几件器物可能是象征着一辆牛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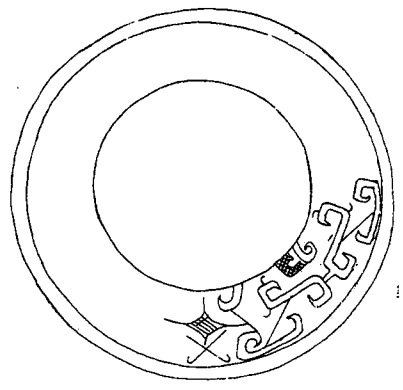
此外，头厢内还出土有部分漆器和少量陶器。漆器中最重要的是带有针刻纪年文字的漆耳杯和错银铜钫漆盂。前者杯口长0.19米、宽0.11米，通耳宽0.144米、高0.16米，针刻文字位于杯底中心，为“卅七年工□□工□□”9字，其中漆工的姓氏不可识，耳下还有刻画而成的“工”字，但笔画较粗；器耳和器身的口沿上则绘有山形的带状纹，其间夹有小簇花的图案。（图二十）后者口径0.282米、底径0.21米、高0.07米，针刻的文字位于盂底中心，为“廿六年左工冢（最）元”7个字，盂的铜钫上用极细的银丝和银箔错成。圆形和交叉直线云纹的图案，器腹上下则有朱绘的几何形纹饰。（图十九）另1件纹饰较为繁复流畅的漆盂，出土是与上述错银铜钫盂上下相合，盂的口沿上绘有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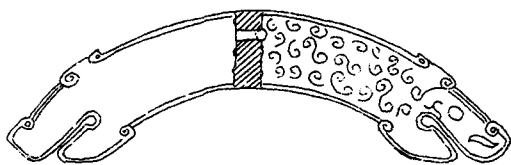
图一 纪凤 M70 出土的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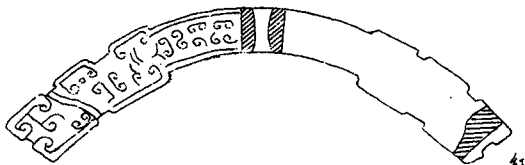
图二 纪凤 M70 出土的内连弧文铜镜 (M70 :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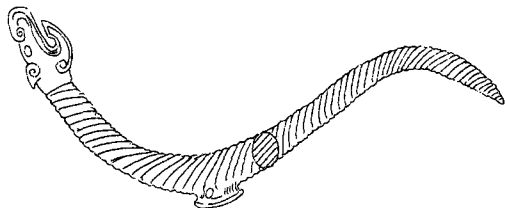
图三 纪凤 M70 出土的玉环 (M70 :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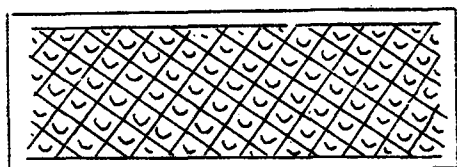
图四 纪凤 M70 出土的玉璜 (M70 :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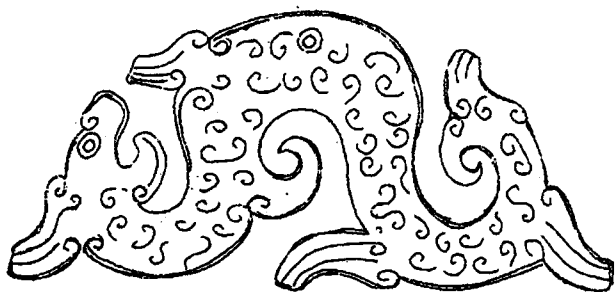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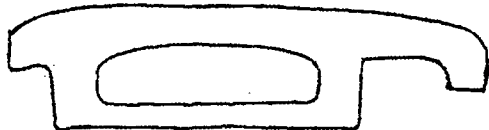
图五 纪凤 M70 出土的玉璜 (M70 :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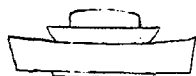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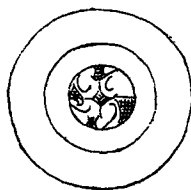
图七 纪凤 M70 出土的玉璜 (M70 :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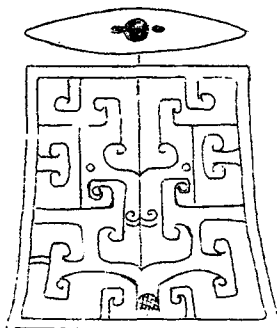
图九 纪凤 M70 出土的玉璜 (M70 :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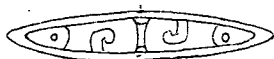
图六 纪凤 M70 出土的玉璜 (M70 : 9)



图八 纪凤 M70 出土的玉璜 (M70 : 13)



图十 纪凤 M70 出土的玉璜 (M70 : 7)



形带状的纹饰，内底中心则绘有一圈云兽纹。

头厢出土的其他漆器还有圆盒和长方形的奁各1件，其中圆盒的腹部纹饰是星云纹，长方形奁盖上的纹饰为龙纹和鸟纹。同时出土的大小耳杯计有8件，其中有杯口长0.25米、宽0.15米、高0.07米的素面大型耳杯，内外均髹漆。（图二十）

头厢出土的陶器仅有甑、盂各1件，发现时甑置于盂上，两者均为灰陶。（图二十一、二十二）

大致是由于水力的作用，头厢内的出土器物均集中在其前半部，尤以右前最为密集，靠近边厢和棺室的后半部仅发现木牛、木槨、小铜环和残漆器各1件。

相对来说，边厢的清理比较简单。这是由于边厢是上部压有棺盖，底部又被原置棺下的苓牀式的花木板所叠压，淤泥量并不太多。出土的器物仅发现圆形残漆盒和残陶罐各1件。前者发现于雕花木版上的淤泥中，后者发现于残漆盒左侧的边厢底部，其器形为侈口、折沿、短颈，在圆腹上密布细绳纹，且体型较大，但已残破过甚，不能复原。考虑到边厢与头厢、槨室之间的隔梁和隔板均已残破或移位，所以不能排